

《唐诗三百首》中没有宋诗吗^{〔*〕}

——与李定广先生商榷

○ 朱光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03)

〔摘要〕莫砺锋先生在《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发表了《〈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考证出《唐诗三百首》所选张旭《桃花溪》一诗,实为宋人蔡襄所作《度南涧》。2007年李定广先生撰文,分十条对莫先生提出了质疑。本文即针对李先生的质疑加以辨析,再次确认《度南涧》等三首诗歌乃蔡襄作品。

〔关键词〕《唐诗三百首》;张旭;《万首唐人绝句》;蔡襄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唐诗三百首》的编者孙洙在卷首序言中引用的这句谚语,已然变为该书最好的广告词。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问世至今,《唐诗三百首》风行海内外,成了一部家喻户晓的畅销书。人们热衷于对其中脍炙人口的佳作名篇进行赏析、品评,至于入选文本的真伪问题,却一直未予认真的考虑。如卷八所收张旭《桃花溪》一诗,自其文本出现以来,实际上就存在着作者归属、诗题差异等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关于李文第一条)

文本出现时间	署名与诗题	文本出处
宋乾道五年(1169)	蔡襄《度南涧》	宋蔡襄《蔡端明文集》卷七(王十朋校本)
宋绍熙元年(1190)	张颠《桃花矾》	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七言卷七二)
宋宝祐元年(1253)	张颠	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前集》卷八
宋末元初	蔡襄《度南涧》	宋陈思《两宋名贤小集》卷七二

作者简介:朱光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系副教授。

〔*〕本文系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建设”(项目批准号12&ZD154)的阶段性成果。

文本出现时间	署名与诗题	文本出处
明嘉靖二十年（1541）	张旭《桃花矾》	明杨慎《升庵诗话》卷一〇
明万历十三年（1585）	张旭《桃花溪》	明吴琯《唐诗纪》（盛唐卷四四）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	张旭《桃花溪》	明钟惺等《唐诗归》卷一三
明崇祯八年（1635）	张旭《桃花溪》	明胡震亨《唐音统笈》卷八五
明末	张旭《桃花溪》	明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
	蔡襄《渡南涧》	
明末清初	蔡襄	清贺裳《载酒园诗话》
明末清初	张旭《桃花溪》	清黄生《唐诗摘抄》
清初	张旭《桃花溪》	清季振宜《唐诗》卷二七三
清初	蔡忠惠	清阎若璩《潜邱札记》卷六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	张旭《桃花溪》	清王士禛《唐贤三昧集》卷下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	张旭《桃花溪》	清徐倬《全唐诗录》卷一〇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	张旭《桃花溪》	清张玉书等《佩文斋咏物诗选》卷九七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	张旭《桃花溪》	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一七
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	张旭《桃花矾》	清王士禛《唐人万首绝句选》卷三
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	蔡襄《度南涧》	清张豫章等《御选宋诗》卷六五
清康熙五十年（1711）	张颠	清郭元釭《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卷五〇
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	张旭《桃花溪》	清陈廷敬等《御选唐诗》卷二八
清雍正十一年（1733）	张旭《桃花溪》	清迈柱等《湖广通志》卷七九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	张旭《桃花溪》	清孙洙《唐诗三百首》卷八

上表所列,乃该诗自文本出现至入选《唐诗三百首》之前,历代被征引、讨论之大体情况:南宋前期,首先以宋人蔡襄《度南涧》诗出现在王十朋所编蔡氏文集中;不久之后,又作为唐人张旭《桃花矾》诗收入洪迈所辑《万首唐人绝句》选本里。宋末,陈景沂在《全芳备祖前集》卷八《花部·桃木》“七言散句”部分,摘录其末两句“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并沿袭《万首唐人绝句》而署名“张颠”。然而稍后的陈思在编辑《两宋名贤小集》时,则仍将该诗归入蔡襄名下。此后的两三百年来,该诗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直至明人杨慎所谓亲见“[张]旭书石刻三诗”的主唐说出现,嗣后诸多唐诗选本纷纷据之征引,从而使得张旭在冠名权问题上获得了明显的优势。仅就笔者上表有关该诗唐宋之争的不完全统计,主唐之说在全部观点中占四分之三强,在清代更是达到了近五分之四的比重。加之清王朝官方“御定”、“御选”、“御订”之书籍,如《全唐诗录》、《佩文斋咏物诗选》、《全唐诗》等多取唐说,这也就难怪《唐诗三百首》会选择尊上、从众的道路了。

相对地,自宋末陈思主张宋说,后世支持者,惟明末清初贺裳、阎若璩等寥寥数人而已。直到二十一世纪初,莫砺锋先生发表《〈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一文,通过详细而缜密的考证,确认《唐诗三百首》所选张旭《桃花溪》一诗,实为

宋人蔡襄所作《度南涧》，在学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时隔数年，李定广先生在《学术界》2007年第5期发表了《〈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与莫砺锋先生商榷》一文（以下简称“李文”），分十条对这一结论又提出质疑。今笔者不揣简陋，就此问题发表一点粗浅的个人看法，对李文提出的质疑进行辨正，向李先生及各位方家求教。

首先，关于清初康熙年间学界对于此诗归属权的判定与论辩，莫先生并非像李文（第一条）所述的那样“只字未提”，而是言简意赅地标举出相关的选家（如黄生、王士禛、“词臣”等）与选本（如《唐诗摘抄》、《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选》、《御选唐诗》等）。相对地，李文则洋洋洒洒用千余字交待了此诗引起清初诸选家青睐的来龙去脉，但列举的编者与选本都没有明显的增益，^[1]且所述似亦无关宏旨。另外，对于《唐诗三百首》的编者孙洙的学术水平的评价，莫先生也没有如李文所称的那样，因为孙氏一时的“以讹传讹”，即贬低其为“有眼无珠、不加甄别、草率编选”。相反地，莫先生对孙洙这位唐诗选家可谓推崇备至，不仅认为他编辑的这个选本“在两个半世纪以来，可以说没有第二本唐诗选本可以超过它”，^[2]而且还“多次劝朋友们，假如你们刚开始读唐诗的话，你第一本应该读的书就是《唐诗三百首》，这是一个最好的唐诗选本，是我们阅读唐诗的入门书”。^[3]特别是从2011年的第1期起，莫先生在《文史知识》开设“《唐诗三百首》佳作解读”的专栏，每期解读一首或几首入选《唐诗三百首》的名篇。

二、主唐说的缺陷：洪迈的编辑与杨慎的举证（关于李文第二、六、七、八、十条）

首先，李文（第二条）不能仅仅因为王十朋所编蔡襄集之“全”而否定其“确实可靠”，“全本”与“善本”之间并无逻辑上的矛盾。所谓王十朋编辑之蔡襄集版本“可信度较高”，乃是相对于洪迈编辑《万首唐人绝句》时草率的态度而言。尽管洪迈是南宋著名的学者，但其所编辑的《万首唐人绝句》因为宋孝宗的偶然眷顾，从最初著录五千余首唐诗绝句的六卷手抄私塾课本，一下子提升为一个“国家级的重大科研项目”。为了达到百卷、万首的预期目标，洪氏不仅把当时能够网罗到的唐人绝句搜了个遍，甚至还将一些律诗从中间裁开，分成两首绝句，或者把宋人的作品改头换面混入其中。所以，洪迈的求全责备确为“贪多务得”。相对地，王十朋编辑时的臻于完备，则是建立在择善而从的基础之上；即其序言中所述“访于故家，而得其善本”，“手校正之”。李文征引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卷二一对于王十朋本蔡襄集源流的考述，不仅不能说明王十朋是“贪多求全”，反而恰恰印证了其编辑的有理有据——蔡氏文集先有十七卷之初刻本，见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袁本前志卷四下又衢本卷一九）、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三五《经籍考》六二；后有蔡襄曾孙蔡洸所刊三十卷本，郑樵《通志》卷

七〇《艺文略》第八题作“《蔡端明集》”，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别集类四）则题作“《莆阳居士蔡公文集》”。乾道四年（1168），王十朋出知泉州，请钟离松等人访得其书，重编为三十六卷；再与教授蒋邕校正木板，乃复行于世，即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一七所载“《蔡忠惠集》”三十六卷之本。据王十朋在卷首序言中所称，是编凡古律诗三百七十首、奏议六十四首、杂文五百八十四首；王氏又曾于张唐英《仁英政要》^[4]中见到过蔡氏所作《四贤一不肖诗》，因旧集中未载，故补录而置于卷首。诸如此类，足见王十朋校刻本所增益者皆有根据。更何况《万首唐人绝句》在七言卷七二著录所谓张旭作品时，不仅题名作“《桃花砚》”、署名为“张颠”，而且将这位初盛唐诗人纳入了晚唐作家的行列。对于这一问题，李文（第十条）根据仅次于“张颠”排列的晚唐书法家“亚栖”的《对御书后又一绝》^[5]而解释为“洪迈所录张旭诗无疑与亚栖一样来自其书法作品”。实际上，不仅《对御书后又一绝》后所收录的亚栖另一诗作《题英禅师》不一定为其书法作品，而且《万首唐人绝句》该卷收录的诗人，大体上以晚唐为主（如“张颠《桃花砚》”之前，依次为“朱贞白《嘲螃蟹》”、“陆龟蒙《题杜秀才水亭》”等作）。洪迈此处的编录次序，恰恰暴露出其编辑工作的漏洞以及此诗归属权的可疑。尽管李文（第八条）声称“《万首唐人绝句》的文献价值不容低估，且张旭《桃花砚》诗还有宋代其它文献佐证”，但诸如《万首唐人绝句》这类书证，其自身文献学价值的高下，也是判定此诗归属必须考虑的因素。我们应该尽力把着眼点放在比较重要的诗歌选本上，李文提及的宋人陈景沂所撰五十八卷的《全芳备祖集》乃类书，或可不在重点讨论之列。不过，李文虽然自恃“认真检索”，却仍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对其考述不利的证据——姑且不论明人曹学佺所编《石仓历代诗选》的“两属”之举（既于卷四二收录张旭《桃花溪》，又于卷一四七收录蔡襄《渡南涧》）；仍以“宋代其它文献佐证”为例，如前所述，陈思所编《两宋名贤小集》于卷七二就将该诗著录为蔡襄的《度南涧》。

诚如李文（第七条）所述“由于唐代文献散失之严重，许多唐诗名篇皆首见于南宋以后文献”，我们不能因此武断地否定其真实性。但对于晚出作品的判定，特别是历来有争议的，确需小心谨慎。梁启超先生曾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列举了十二条鉴别伪书的方法，第一条即为：“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什有九皆伪。”^[6]即以李文所举诸多唐诗名篇为例，《清明》诗就不一定为唐人杜牧所作。李文关于该诗“首见于南宋末年人所编之《千家诗》”的提法不确，该诗文本的第一次出现，是在南宋末年人所编的《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二六，但题为“《杏花村》”，并且仅仅注明“出唐诗”而语焉不详。其首次署“杜牧”之名并正式题作“《清明》”，则是在稍后成书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该诗被列在“清明类”的首篇。《千家诗》是一本在《唐诗三百

首》问世之前发行量很大的普及性诗歌选本，^[7]旧题刘克庄编选，经现代学者考证，实为福建书商假借刘氏盛名而伪造；即以所谓《清明》诗为例，刘克庄的《后村诗话》对杜牧诗作多有精当辨析，却只字未曾提及这首作品。^[8]落实到这一问题上，正是因为“首先选录张旭诗的是南宋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与张旭生活年代的时间跨度长达四百多年，所以才使人对于此诗的归属权产生了怀疑。

对于杨慎《升庵诗话》中的这一反例，莫先生并未有意回避，而是进行了较为缜密的考订。问题的关键在于《升庵诗话》的论述本身不可轻信，实不足以成为李文（第六条）所谓的“铁证”。状元出身的杨慎，在明代享有盛名；但作为才子的他，也难逃明人学术粗疏的陋习。如《升庵诗话》卷一四《〈丽人行〉逸句》条，^[9]提及友人陆深（即“陆三汀”，也就是《升庵诗话》卷一〇《张旭诗》条中为其诵读张旭《春草帖》一诗的“陆子渊”^[10]）曾经告诉他杜诗的一个古本，其中《丽人行》一诗，在“珠压腰褭稳称身”下面还有“足下何所著？红蕖罗袜穿镫银”两句。但这所谓的“逸句”，不仅今本杜诗无之，清代许多学者遍考宋刻本亦无。因此，极有可能是杨氏假托古本而自行拼装后添加的——“足下何所著”，当袭取杜诗《丽人行》前句“头上何所有”及“背后何所见”；“红蕖罗袜”，当化用杜诗《千秋节有感二首》（其二）“罗袜红蕖艳，金鞵白雪毛”句；“穿镫银”，或模仿韩偓《马上见》诗句“和裙穿玉镫，隔袖把金鞭”。莫先生于杨慎此类单文孤证的手段相当熟悉，^[11]故而对于著录此诗为张旭作品的《升庵诗话》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证：“这所谓的‘旭书石刻三诗’在明清以来的书谱中也毫无踪影”“他所说的张旭真迹居然连诗题与本文都和《万首唐人绝句》所载者毫无二致，而他又是读过《万首唐人绝句》的”。在此基础上，莫先生还进一步细致地阐述了后人对于杨慎提法的因袭，而非李文所谓“轻描淡写，顾左右而言他”。为了证成己说，李文还认为杨慎“不太擅长理论，却最擅长考辨，其理论观点时有瑕疵，但文献上很少出问题”；事实恰恰相反，杨慎的学术论断的最大问题往往出在文献方面。杨氏长年僻居云南，著述时缺乏典籍，常常仅凭记忆，故多有文献舛误，有时干脆随意伪撰古书。对此，前人早有定论，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六《诗话补遗》提要所述“慎在戍所，无文籍可稽，著书惟凭腹笥……如斯之类，亦引据疏舛”。更有甚者，杨慎在文献资料上还经常假托他人之言而有意作伪。如其在正德十六年（1521）所写的《石鼓文序》（《升庵集》卷二）中即声称，李东阳曾经对他说自己“犹及见东坡之本，篆籀特全”，将为“手书上石”，未竟而卒。他因此以李东阳旧本著录而收藏之，并且还在《金石古文》一书中提及得到了石鼓文的这一唐时拓本，凡七百零二字，乃为全文。对于该说法，四库馆臣在《石鼓文音释》一书的提要中予以了驳斥，“今考苏轼《石鼓歌》自注，称：可辨者仅‘维罽贯柳’数句。则称全本出於轼者，妄。又韩愈《石鼓歌》有‘年深阙画’之语，则称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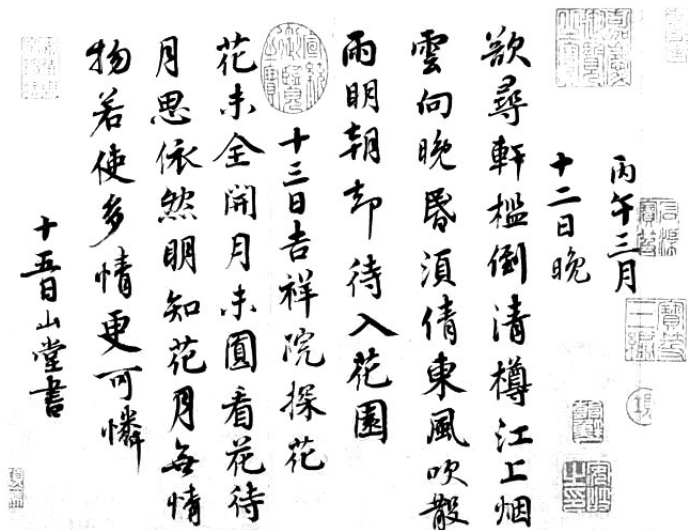
本出唐人者，亦妄。即真出东阳之家，亦不足据，况东阳亦伪托欤！”所以杨慎非但不是“在文献上很少出问题”，而是经常出现严重的问题——伪造文献，正如四库馆臣一针见血的定论：杨慎“好伪撰古书以证成己说”（《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九《丹铅余录》提要）。

三、主宋说的力证：蔡襄的书法作品（关于李文第三、四、五、九条）

首先，蔡襄题写唐诗的行为，不能证明此诗即为其所书唐人作品；李文（第三条）所述“北宋人普遍喜欢用书法手段（包括题扇、题画、题壁等）题写唐诗，或原封不动或改动几个字，且常常被公开收入题写者文集”，只是“不能排除《桃花溪》是蔡襄所书唐诗”的一种可能性而已。据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二《蔡端明书唐人诗帖》的记载，蔡襄曾于庆历五年（1045）冬题写了四首唐人绝句，包括刘禹锡的《石头城》、李白的《清平调》二首（“云想衣裳花想容”和“名花倾国两相欢”）以及一篇杜牧的作品。蔡氏手书与通行文本之间存在些许差异，如刘禹锡“淮水东边旧时月”作“唯有淮东旧时月”，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作“叶想衣裳花想容”等；于此，刘克庄解释为或许因为其“饮后口熟手误”。藉此可知，蔡襄确实和不少北宋书家一样，有随意题写唐诗的习惯；但这点并不能证明此诗即为其所书之唐人作品。何况李文所举宋人改写唐诗而被收入文集的事例，实为另一文化现象，^[12]与此诗的归属权关涉不大。而蔡襄书法作品本身的真伪，乃是判定此诗作者的基础，李文（第五条）所谓“蔡襄书法真迹经过鉴定与《桃花溪》诗的作者之间无必然之联系”的说法不能成立。由于蔡襄对其书法颇为自惜，不肯轻易下笔，也就造成了其传世作品相对较少的情况。因此，考述蔡氏《山堂诗帖》之真伪，乃是判定此诗归属权的基本点。试想，倘若字迹本身即不真实，那么所写之内容就不得不打上大大的问号了。

其次，李文（第四条）关于“蔡襄书法日期不能等同于行迹”的判定有失偏颇，诗题所标日期或书法所署时间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诗人的活动轨迹。蔡襄（1012 - 1067），字君谟，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天圣八年（1030）进士，官至端明殿学士。事迹具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三五《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宋史》卷三二〇本传。治平三年（1066），其出任杭州知州，多西湖之游历与吟咏之作品（“南涧”、“天竺山”、“吉祥院”等皆为西湖的著名景点）。李文认为蔡襄诗帖中的题名《十二日晚》乃其当时的书写时间，这应该是由于未曾亲见蔡氏《山堂诗帖》书法真迹，而仅仅根据蔡氏文集之诗题随意猜测的结果。事实上，蔡襄此帖至今尚存，该书法作品的原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真行书，棉纸，宽24.8cm、长26.7cm，凡78字）：（图见下页）

正如下图所示，该帖于诗题“十二日晚”之前，尚有“丙午三月”四字；^[13]《十



三日吉祥院探花》，亦较文集所题诗名多一“院”字；特别是在两首诗作的文本之后，较之诗题降低约两三字的高度，题写了“十五日山堂书”六字的落款，从而清楚地交待了创作该帖具体的时间、地点。由此可知，《丙午三月十二日晚》这一描写游览时遇雨的诗作，并非李文所推测是蔡襄在“十二日晚书张旭诗而忘了诗题”，而极有可能是蔡氏在十五日游览龙华、净明两院的时候又遇到下雨（该组诗第二十二首为《十五日游龙华净明两院值雨》），触景生情在山堂所写。历代书谱所录两诗题目皆为全称，如明郁逢庆《续书画题跋记》卷三“蔡君谟十帖真迹”，明张丑《真迹目录》卷二“蔡忠惠公十帖”，明汪砢玉《珊瑚网》卷三“蔡君谟十帖真迹”，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一〇“蔡君谟十帖”，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三八一“蔡君谟十帖（内《山堂书帖》）”、卷三九三“宋贤墨迹”等；只是蔡襄文集的编辑者在著录题名时有所省略。据此亦可推知，蔡襄描摹是年三月四日清明（该组诗第十五首为《四日清明西湖》）之后至三月十日（该组诗第十八首为《十日西湖晚归》）之前一段时间内游历的两首诗歌作品《度南涧》（该组诗第十六首）与《入天竺山留客》（该组诗第十七首），当作于此五、六天之中或稍后不久的时间之内。

另外，《丙午三月十二日晚》在被引述的过程中以及与所谓“张旭《春游值雨》”之间，在文本上亦稍有差异：（表见下页）

如下表所示，“倒”，或作“到”，或作“列”；“樽”，一作“尊”；“花”，一作“华”。“到”与“倒”相通，而“列”字当为形近于“到”所致。“樽”是酒杯，“尊”为酒器，两字亦可通（然从《万首唐人绝句》因袭《端明集》之“尊”字，或可推知洪迈在编辑时所据之文本，乃蔡襄文集而非其书法作品）。而“华”与“花”两字也可通用。至于李文（第九条）认为“‘华园’即华林园，六朝时著名宫苑，故址在

文本冠名	文本系统	文本内容		
蔡襄《丙午三月十二日晚》	法书	《山堂诗帖》	倒清樽	入花园
	书谱	《续书画题跋记》卷三	到清樽	
		《真迹目录》卷二	倒清樽	
		《珊瑚网》卷三	到清樽	
		《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一〇	倒清樽	
		《六艺之一录》卷三八一	到清樽	
	《六艺之一录》卷三九三	倒清樽		
张旭《春游值雨》	文集	《端明集》卷七	倒清尊	入华园
		《升庵集》卷五四	列清樽	
		《诗话补遗》卷一	倒清樽	
	选本	《万首唐人绝句》卷七二	倒清尊	
		《石仓历代诗选》卷四二	列清樽	
		《全唐诗》卷一一七	列清尊	
		《御选唐诗》卷二八	列清尊	

今南京古台城内，齐梁诸帝常宴集于此。……张旭是东吴人，‘华园’正在其家乡”，则似牵强。姑且不论张旭本苏州人，地处南京的华林园恐难以算作其家乡之物；即以此游历诗作而言，所述景物，亦不必拘泥于作者本人乡土之地。事实上，诗中所提及“明朝”将入之花园，确有所指；但并非南京的华林园，而是杭州吉祥寺院中的花园，也就是该帖第二首作品《十三日吉祥院探花》所述诗人“探花”的地方。据宋人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七六记载，“[吉祥]寺地广袤，最多牡丹，名人巨公，皆所游赏。”而该组诗第二十四首《十八日陪提刑郎中吉祥院看牡丹》、第二十六首《十九日奉慈亲再往吉祥院看花》两篇，亦可作为旁证。

最后，通读蔡襄作品，对比标题与正文，是我们判定此诗归属的重要途径。李文（第九条）分析的“蔡集重出三诗，诗题和正文与张旭诗相异处”，确为“判断著作权归属的重要证据”；但其沿袭了旧注“常德府桃源县西南有桃源洞，洞北有桃花溪”的说法，将诗中所写地点落实到今天的湖南省境内，从而得出“蔡集或文不对题或点金成铁”的结论，则显得过于武断。

闻道春深多物华，遥怜春日思无涯。烟涵树色相依好，山拥溪流一带斜。
休问主人先看竹，只随渔叟便逢花。凭谁画得当时境，持去江南细与夸。

山前溪上最宜春，千树夭桃一雨新。争得扁舟随水去，乱花深处问秦人。

——《闻福昌院春日一川花卉最盛》（《端明集》卷四）

何物山桃不自羞，欲乘风力占溪流。仙源明有重来路，莫下横波碍客舟。

——《建溪桃花》（《端明集》卷五）

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

——《度南涧》（《端明集》卷七）

……桃有援兮溪之曲，莲为媒兮泽之湄……

——《季秋牡丹赋》（《端明集》卷三二）

通读上述蔡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无论身处何地（建州、杭州），使用何种体裁（七律、七绝、赋），他描写桃花题材时，多喜欢用桃花源的典故，且大都涉及

水(“溪流”、“流水”、“溪之曲”)、船(“扁舟”、“客舟”、“渔船”)、人(“渔叟”、“秦人”)等形象。原为现实写景之作,但经过诗人精心的艺术构思,运实入虚,从而营造出有层次感、立体感的意境,宛如一幅幅用笔轻灵、意境幽深的水墨图。由于诗人将着眼点放在了象外之境,诗中难有勾勒具体风物的相关描述;加之古人所写之景,大多如水墨画之随意点染,而非工笔画之面面俱到。因此,尽管这首《度南涧》从飞桥缥缈、野烟弥漫的远景写到石矶西畔、停泊渔船的近景,我们并不能苛求藉此领略到杭州西湖灵隐山中的“南涧”风光。所以,无论是“《度南涧》”(《蔡端明文集》),还是“《桃花矶》”(《万首唐人绝句》),或是“《桃花溪》”(《唐诗三百首》),均可作为此诗的标题,而非“文不对题”。或许正是洞察了写景诗的这一特质,洪迈在编辑时才有意略去了具体的地名而改题为更宽泛的名称(类似地,如将“《入天竺山留客》”改为“《山行留客》”),从而使得“蔡”冠“张”戴的这一行为不留痕迹。

综上所述,李文的诸多质疑皆不能成立,《度南涧》等三诗的著作权应归蔡襄。也就是说,《唐诗三百首》中所收“张旭《桃花溪》”实为宋人蔡襄之诗。

注释:

[1] 所举只有四库馆臣关于清人王士禛《唐贤三昧集》的评述是新的例证,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观点乃乾隆四十六年(1781)所发,晚于《唐诗三百首》十七年,可以不予考虑。

[2] 莫砺锋:《唐宋诗词与现代生活》讲稿,见叶皓主编:《走进市民学堂》,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0页。

[3] 莫砺锋:《莫砺锋说唐诗》,第十四讲《时光节候》,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77页。

[4] 即张唐英所撰《仁宗君臣政要》一书(《秘书省四库阙书目》题作“《仁宗政要》”)。是书随事立题,自天圣初(1023)至嘉祐八年(1063)三月,凡二百八十五条,分为四十卷。

[5] 李文漏题“后又一绝”四字。

[6]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1页。

[7] 孙洙编辑:《唐诗三百首》的初衷就是因为“世俗儿童就学,即授《千家诗》,取其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并且希望《唐诗三百首》能够“较《千家诗》不逊胜耶”(《唐诗三百首·蘅塘退士原序》)。

[8] 有关《清明》诗的讨论,可参见吴在庆先生《杜牧集系年校注》的相关注释,中华书局,2008年,第1432页。按:吴先生对于此诗文本之溯源,亦误以为首见《千家诗》。

[9] [10]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第922、827页。

[11] 参见程千帆:《杜诗伪书考》,见《古诗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345、359页;莫砺锋:《杜甫诗歌讲演录》,第四讲《杜诗的清代注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2] 具体论述可参见清人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改古人诗”条。

[13] 据蔡襄生平可知,此“丙午”即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

[责任编辑:黎虹]